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齐鲁历史文化名人传略/刘德龙主编. — 济南:齐鲁书社,
2006.4

ISBN 7-5333-1630-4

I. 齐… II. 刘… III. 文化—名人—列传—山东
省—古代 IV. K825.4

齐鲁历史文化名人传略(古代卷)

刘德龙 主编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招远市新华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32 开
印 张	20.125
字 数	501 千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33-1630-4/K·503
定 价	40.00 元

《齐鲁历史文化名人传略》

编辑委员会

主 任：王 敏

副主任：王志民 刘德龙

委 员：包心鉴 刘蔚华 孙其海 李海萍

陈秉山 岳增瑞 孟祥才 翁惠明

高 航 陶滋年 薛庆国

主 编：刘德龙

副主编：李海萍 高 航

撰 稿：刘德龙 李海萍 高 航 张伟红

杨宗杰 曲 艺 郭墨兰 贾斌昌

QIANYAN

前言

齐鲁大地，地灵人杰。齐鲁人民在创造了灿烂的齐鲁文化，奠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的同时，也建构起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构架。正是因为齐鲁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与深厚的文化底蕴，齐鲁大地才人才辈出。通过名人传略，生动再现齐鲁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领会民族文化的基本内涵与历史渊源，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先进文化建设，而这也正是编纂《齐鲁历史文化名人传略》的主旨。

1

齐鲁文化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史前期、先秦秦汉时期、魏晋至明清期。史前期主要是新石器时代的东夷文化，是齐鲁文化的渊源时期。先秦、秦汉时期是齐鲁文化的鼎盛时期，特别是西周齐、鲁建国及春秋战国时期。夷、夏民族和人文全面交汇融合，由分流发展趋向融合，中国文化便以齐鲁文化为主体和核心，不断吸收其他异质文化发展成熟起来。魏晋至明清时期，是齐鲁文化的流风余韵时期，齐鲁文化在守成的心态中逐步走向相对衰落，作为一个局部，仍然保持一定的特色。

齐鲁地区是古代中华文化和文明发祥最早的地区，在劳动人民的长期实践中，齐鲁文化体现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等。国以民为本、和为

贵、礼为制、才为用；人以仁德为本、义信为重；“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仁者爱人”、“民贵君轻”、“兼爱”、“非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理念潜移默化的影响，构筑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也造就了齐鲁人民刚健自强、宽厚仁和、忠义豪爽的性格，而为世人称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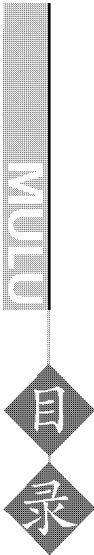
齐鲁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与深厚底蕴是其共性，齐鲁大地辈出的文化巨子各有千秋，是个性。对齐鲁文化的全面了解，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个体；通过每一个名人的传略，生动了解齐鲁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通过名人传略全书，领会齐鲁文化深刻的历史渊源，进一步了解齐鲁文化乃至民族文化的基本内涵，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本书的编写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记述入选人物；坚持真实、完整、公正、准确、生动的原则，将历史文化名人的生平事迹、文化成就和对后世的影响以传记的形式展现出来。

《齐鲁历史文化名人传略》入选人物，一是祖籍是山东；二是祖籍虽然不是山东，但其本人出生和家居山东，或一生主要活动在山东、成就于山东的对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具有影响的六十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教育家、科学家。按照人物出生和活动的历史年代来排列立传次序，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五个时期，采用通俗白话叙述，兼顾了可读性和故事性。

我们不能把这本书简单地理解为诸多名人的事迹介绍，应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从中发现齐鲁文化的发展规律，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以启迪当代与后世，而这正是编者的心愿，也是此书的价值之所在。

编者

2005年9月



前言 1

一、先秦时期

兵家始祖——姜太公 1

治国贤相——管 仲 16

谏臣贤相——晏 子 29

儒家至圣——孔 子 40

兵家至圣——孙 武 60

史坛巨匠——左丘明 70

工匠始祖——鲁 班 81

墨学始祖——墨 子 91

儒家述圣——子 思 105

比肩孙武——吴 起 112

医家之祖——扁 鹊 124

稷下辩士——淳于髡 133

儒家亚圣——孟 子 142

鬼谷高足——孙 臆 157

出世哲人——庄 子 169

阴阳大家——邹 衍	183
儒学大师——荀 子	191
天文先驱——甘 德	207
儒家先贤——伏 胜	216

二、秦汉时期

汉家儒宗——叔孙通	224
东渡先驱——徐 福	232
布衣儒相——公孙弘	241
一代奇达——东方朔	249
农学先驱——氾胜之	265
儒林经神——郑 玄	274
春秋学海——何 休	286
算学奇才——刘 洪	295
圣裔伟才——孔 融	303
妙辞逸才——刘 桢	315
七子冠冕——王 粲	322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

经学大师——王 肃	332
千古智圣——诸葛亮	340
早逝奇才——王 弼	353
纸贵洛阳——左 思	367
书家至圣——王羲之	377
乱世贤相——王 猛	387
天文大家——何承天	399

MOU

文论泰斗——刘勰	406
农学巨匠——贾思勰	415
家训大师——颜之推	426

目
录



四、隋唐五代宋元时期

初唐名相——房玄龄	435
理财能臣——刘 晏	443
书坛巨擘——颜真卿	454
苏门学士——晁卜之	464
翰林画师——张择端	473
婉约词宗——李清照	482
词坛豪杰——辛弃疾	496
全真宗师——丘处机	509
元曲泰斗——张养浩	519
农学大家——王 祯	529

3

五、明清时期

演义先驱——罗贯中	537
嘉靖才子——李开先	547
狂生傲吏——李攀龙	557
民族英雄——戚继光	566
清代诗宗——王士禛	576
聊斋先生——蒲松龄	588
传奇大家——孔尚任	600
西学先驱——薛凤祚	610
兴学义丐——武 训	618
甲骨学者——王懿荣	627

后记	635
----------	-----



一、先秦时期

兵家始祖——姜太公

姜太公，姓姜，名尚，字子牙。生卒年不详。姜太公的先祖曾封于吕，故以吕为氏，又称“吕尚”。此外，在先秦文献中还称他为“太公望”、“吕望”、“吕牙”、“太公”、“师尚父”等，后世则俗称其为“姜子牙”。姜太公是我国商周之际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是西周文、武、成王三代的主要政治、军事宰辅，史称其“佐天子为圣臣，治邦国为圣君”，为西周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卓著功勋；同时，他也是春秋战国时代最强大的封国之一——齐国的开国始祖。姜太公的政治思想和军事谋略，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和军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1

暮年大任 助鼎天下

关于姜太公的家世，没有确切的史料可以考证，一般认为他的远祖是炎帝神农氏。《国语·晋语四》说：“昔少典氏娶于有蜎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其后，姬、姜两姓即累世联姻，成为两个血亲关系极密切的部族；在姬周政权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姜姓部族一直是周邦最为得力的羽翼。《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



姜太公像

“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苗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可见，姜太公的先祖在虞舜时曾任“四岳”（尧、舜时掌管四时、主持方岳巡守之事的官长），因辅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封在吕或申（都在今河南南阳一带）。而太公这一枝经过不断的

发展和迁徙，仍以封姓吕为氏，所以姜太公又称吕尚。

关于姜太公的出身之地，史料中都没有确凿可信的记载。《孟子》的《离娄上》和《尽心上》两章都提到姜太公“居东海之滨”；《吕氏春秋·首时》也说，“太公望，东夷之士也”；《史记·齐太公世家》也说他是“东海上人”。但这些说法都很笼统含糊。晋代张华《博物志》说得较为明确：“海曲城有东吕乡东吕里，太公望所出也”；《水经注·齐乘》也说，“莒州东百六十里有东吕乡，棘津在琅邪海曲，太公望所出”。汉代的“海曲”在今山东日照一带，“莒州”也在今日照下辖的莒县一带。据此，一般认为姜太公的出身之地在今山东东部黄海之滨的日照、莒县一带。

姜太公的家世是显赫的，但是其出身却是低微的。很多历史文献中都提到他遇周文王之前曾经做过不得志的屠夫和小商贩。《战国策·秦五》说，“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尉繚子》说：“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棘津”；《韩诗外传》说：“吕望行年五十，卖食棘津，年七十，居于朝歌。”汉代刘向的《说苑·尊贤》也说：“太公望，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

人也。”这些文献虽然语焉不详，说法不一，但是大致都透露出姜太公垂暮之年还曾在棘津做过卖吃食的小贩，在朝歌当过屠夫。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姜太公曾经是夫人家的赘婿，后来因为不擅生计而被老妇逐出家门。《战国策·秦五》说他是“齐之逐夫”，高诱注解是“为老妇之逐”，即姜太公是作为赘婿被老妇逐出的。刘向也说“太公田不足以偿种，渔不足以偿网”（《说苑·杂言》），最后被老妇逐出家门，所以说“太公望故老妇之出夫也”（《说苑·尊贤》）。

还有一些文献提到，姜太公在遇到周文王之前，曾经在商纣王朝中担任过官职，后来因不满商纣王的暴虐无道而离开，过了一段游说和隐居生活。《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说：“或曰，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归西伯。”至于姜太公事纣、游说和隐居的具体细节，历史文献中都鲜有提及。

姜太公的大半生一直很不得志，可以说是怀才不遇。直到在大约七十岁之后遇到周文王（西伯姬昌）时，令他大器晚成的历史机缘才姗姗到来。

姜太公遇文王的具体情况，仅《史记·齐太公世家》就记述了三种不同的说法。除了上引姜太公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归顺西伯的说法之外，“渭川坐钓遇文王”的说法更具有传奇色彩：“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钓渔奸（通“干”，求取）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螭，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出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悦，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一个“奸”字表明了姜太公垂钓渭水是有预谋的，其真实意图不过是等待文王的到来。

《史记·齐太公世家》中的另一种说法则说吕尚原是不仕之士，隐居在海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在羑（yǒu）里的时候，其手下的大臣散宜生、闳夭等素知姜太公的才智，就去召请他。姜

太公也听说文王有贤名，尊长者，欣然应召。三人设计献美女奇物给纣王，终于将文王赎了出来，使文王得以返回邦国。

总之，不管是哪种说法，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姜太公归周后，才真正得遇贤主，得以施展其非凡的文韬武略，成为文王、武王及成王三代最主要的政治、军事宰辅。

周文王从羑里返回邦国后，姜太公出谋划策，辅佐他内修文治，外树武功，为伐纣灭商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齐太公世家》说，“周西伯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意思是说，文王自羑里脱身回来后，与吕尚密谋施行德政去推翻商朝的政权，这些事大都体现了用兵的权谋与奇妙的计策，所以后世谈论用兵及周的权术都推崇姜太公是主要的策划者。根据历史文献，周文王当时采取的策略，主要是表面上对商纣无比恭顺而暗中则积极进行反商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对内推行德政，修德爱民，如开仓赈济鳏寡孤独等；对外一方面争取虞、芮等小国的拥护，一方面则出兵灭掉崇、密须、犬夷等商朝的附庸国；同时，大力兴建丰邑，使周的势力悄悄向东发展。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逐渐蚕食和削弱了商纣的统治，使周的势力范围得以极大的扩展，为武王伐纣灭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一切，大多出自姜太公的谋划，正所谓“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齐太公世家》，以下只注篇名）。

周文王死后，周武王继位，以“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周本纪》）。此后，姜太公继续辅佐周武王完成文王未竟的事业，参与策划和指挥了反商伐纣的军事行动，为西周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重要贡献。

据《齐太公世家》记载，周武王九年的时候，曾经进行过一次反商伐纣的军事预演，在盟津（即孟津，在今河南孟津县东北）结成了反商大同盟。“九年，欲修文王业，东伐以观诸侯集

否。师行，师尚父左杖黄钺，右把白旄以誓，曰：‘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遂至盟津，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也。’”为了试探诸侯是否听从号令，军队出发时，姜太公手执黄斧白旄誓师，说：“苍兕苍兕（水兽名，这里指掌管舟楫的官名），集合你们的部队，给你们船只，迟到的斩首！”到了盟津后，诸侯事先未经约定而前来会师的就有八百家，并一致认为可以讨伐纣王。由于武王认为时机尚未成熟，这次并没有真正展开伐纣的军事行动。不过，通过这次试探性的会盟，姜太公实际上是协助武王成功地组织了一次伐纣的军事演习，联合诸侯，结成了反商大同盟。

两年后，商纣王残忍地剖杀了贤臣比干，囚禁了贤臣箕子，进一步暴露了其暴虐无道的本性，武王伐纣的时机终于到来了。可是，出师前进行占卜的结果却不吉利，而且暴风雨大作，大臣们都感到恐惧。只有姜太公不迷信龟兆和天象，说“枯骨死草，何知吉凶”（《论衡·卜筮》），认为枯死的龟骨和薻草哪里知道什么凶吉，坚决劝武王出兵。于是，武王出师伐纣，在牧野与商纣进行了大决战。《史记·周本纪》记载：“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拒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武王会集诸侯兵力四千辆战车陈师于牧野，纣王也发动大军前来拒敌。武王先派师尚父带领百名勇士冲入敌阵挑战，然后以大部队冲向纣王的部队。最终纣王大败，登鹿台自焚身亡。可见，在武王伐纣从谋划、决策、出征到败敌的全过程中，姜太公都表现出超人的胆识和才智，不仅是文治武功兼具的领兵主帅，而且也是身先士卒的战场勇士。《诗经·大雅·大明》这样赞颂牧野之战中的姜太公：

牧野洋洋（牧野战场多宽广），
檀车煌煌（兵车鲜明而堂皇），
騂骖彭彭（战马威武而雄壮），

维师尚父（我们的统帅师尚父），

时维鹰扬（真像苍鹰在飞翔）。

灭纣之后，武王采取了一系列做好战争善后工作以及稳定民心、巩固政权的措施。他一方面散发商纣囤积的钱粮，赈济贫民，即所谓“散鹿台之钱，发钜桥之粟，以振贫民”；另一方面，“封比干墓，释箕子囚”，以争取人心。同时“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除旧布新）”。所有这些，也是“师尚父谋居多”（《齐太公世家》）。

周武王推翻商纣、定鼎天下以后，对功臣谋士和宗室进行了大分封。《史记·周本纪》载，武王“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由于功勋卓著，姜太公被作为第一号功臣，封在齐地，建都营丘（今山东临淄东北）。之所以将他封到齐地，可能出于两种考虑，一是姜太公本是东海一带的人，二是当时齐地是东夷（东方各部落）杂居的地方，在周的政权刚刚建立之时秩序尚未完全稳定，要依靠他去治理，以达到“以蕃屏周”的目的。

据《齐太公世家》记载，姜太公带领随从和兵士前往封国的路上，夜宿旅舍，走得很慢。旅舍的主人在外面议论说：“时机难得而容易错过，这些客人睡得很安稳，大概不是去封国就任的吧。”姜太公猛然惊醒，穿上衣服连夜赶路，天亮时就到达营丘。果然，营丘附近的莱夷人前来攻打。原来周政权刚刚建立，还未及安定远方各国，所以莱侯趁乱前来争夺营丘。幸亏姜太公及早赶到，击退莱人，建立齐国，为西周政权在东方开创了一个稳定的局面。

周武王平定天下后两年就去世了，尚在襁褓之中的周成王即位。武王的弟弟周公姬旦担心天下人趁机反叛周室，就代替成王摄政。这时宗族内部就有人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干出不利于成王的事情。同时，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也勾结原是被武王派去监督他的管叔鲜、蔡叔度等人，觊觎王位，蠢蠢欲动。在这样关键的时

刻，周公首先寻求姜太公等老臣的支持。“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退避）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反叛）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鲁周公世家》）正是在姜太公等老臣的理解和支持下，周公才得以安定了内外人心，稳住了局势。后来，当周公准备东征去平定武庚、管、蔡叛乱的时候，又派召公奭以成王名义命令姜太公说：“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太公世家》）姜太公很好地完成了“以蕃屏周”的重任，支持周公摄政讨逆，为稳定西周政权、维护天下一统做出了重要贡献。

姜太公封齐之后，对齐地进行了精心的治理，经过一番艰苦的创业之后，逐渐建立了一个强大而富庶的东方诸侯国，并开创和形成了独特的齐文化传统，由此成为齐国的开国始祖和齐文化的奠基人。

根据史书的记载，齐都营丘一带原是一片荒凉的盐碱地，出产不多，人口稀少。《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说：“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xì，盐碱地）卤，人民寡。”《汉书·地理志》也说：“齐地负海潟卤，少五谷而人民寡。”在这种情况下，姜太公本着务实的原则采取了“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渔盐之利”（《齐太公世家》）和“尊贤智，赏有功”（《汉书·地理志》）等一系列措施来治理齐国。在政治上，他大力推行“尊贤尚功”的治国方针。《吕氏春秋·长见》记述了一段姜太公和周公旦关于如何治理自己封国的对话，与周公旦的“亲亲上恩”不同，姜太公提出的治国方针是更注重实际效用的“尊贤尚功”，也就是尊重贤者，推重功业。在文化上，他则因地制宜地提出“因其俗，简其礼”，也就是尊重当地风俗，简化礼制，实行文化宽容政策。在经济上，他提倡商业和手工业，并利用齐国的沿海条件，发展渔盐生产。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终于将齐国建设成为一个实力雄厚而且“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

（《货殖列传》）的东方大国。同时，在治理齐国的过程中，他将形成于西方黄土高原的周文化与呈现出浓厚的滨海特色的东夷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齐文化传统。

文韬武略 安邦立国

姜太公是商周之际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的军事思想和政治思想内容很丰富，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文献稀少，所以现在很难见其全貌。较为集中地体现姜太公政治和军事思想的是大约在战国中后期出现的《六韬》一书。《六韬》是一部以周文王、周武王与姜太公对话的形式写成的谈论治国与用兵之道的兵书，所论话题广泛涉及政治、军事、哲学等各个领域，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和《犬韬》六篇。虽然《隋书·经籍志》兵家类题《六韬》为“周文王师吕望撰”，但自宋代以来的学者多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六韬》不是姜太公的著作。目前一般认为，《六韬》应该是在战国中后期由后学假借姜太公之名写成的。《六韬》虽然不是姜太公亲著，但却是保留和反映姜太公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的集大成著作。

姜太公的政治思想概而言之，主要表现为以民为本的爱民思想、举贤尚功的实用思想、重视赏罚的法纪思想和重视发展农业与工商业的经济思想。

姜太公从商之所以亡和周之所以兴的时代更迭之中深深地体会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独得）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文韬·文师》）的道理。所以，当文王问他“治国之大务”时，姜太公的回答是“爱民而已”（《文韬·国务》）。而爱民的具体含义是“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具体做法则是“民不失务则利之，农不失时则成之，省刑罚则生之，

薄赋敛则与之，俭宫室台榭则乐之，吏清不苛扰则喜之”；相反，如果“民失其务则害之，农失其时则败之，无罪而罚则杀之，重赋敛则夺之，多营宫室台榭以疲民力则苦之，吏浊苛扰则怒之”（同上）。可见，姜太公爱民思想主旨就是要保障人民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惠民利民，顺应民心民意。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姜太公就封齐国时，才会根据齐地的实际情况实行“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渔盐之利”等一系列顺民、富民的政策。

在提倡爱民的同时，姜太公还主张“尊贤尚功”，推行注重实效的治国方略。《六韬·文韬》中有《上贤》、《举贤》两章，大体都是对姜太公“尊贤尚功”思想的具体陈述。“尊贤尚功”的具体含义是尊重和任用贤能的人才，推重和崇尚功利、功业。“尊贤”是“尚功”的前提，“尚功”则是“尊贤”的最终目的。《举贤》篇中，面对文王提出的“君务举贤而不获其功”的矛盾，太公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举贤而不用，是有举贤之名，而无用贤之实也”，而造成这种“有名无实”的过失则在于“君好用世俗之所誉，而不得真贤也”。他进一步指出了举贤中常见的弊病：“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结党）者进，少党者退。若是，则群邪比周（结党营私）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奸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则国不免于危亡。”要避免这样的弊病，就应该“按名督实，选才考能，令实当其名，名当其实，则得举贤之道矣”。在《文韬·六守》中，姜太公还提出了选用人才的“六守”，也就是六条应该坚持的标准，即“仁”、“义”、“忠”、“信”、“勇”、“谋”，并提出了用人时对这六条标准进行考核的具体办法。总之，姜太公的“举贤尚功”思想充满了很强的效益意识和务实精神，同时也具备很强的可操作性。

与“尊贤尚功”的实用思想相应，姜太公非常重视法纪和赏罚。《文韬·法治》中说，文王问太公“治国之所贵”，太公说，